

“记忆同一性”的左翼路径及其认同难题初探 ——以马克斯·西尔弗曼的《羊皮古书的记忆 ——法国与法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大屠杀与殖民主义》为例

张蕴艳

摘要:本文介绍了马克斯·西尔弗曼的《羊皮古书的记忆——法国与法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大屠杀与殖民主义》一书关于跨文化、跨民族的记忆动力学研究。从记忆政治与记忆诗学两方面回顾了他提出的“羊皮古书的记忆”的概念的特点,即他倡导一种全球化语境下层累的、杂糅的多元记忆结构,而非单一的或二元对立的记忆结构。对于以往突出表现于人道主义讨论领域的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命题,他的记忆理论是一种反思与突破。但其因提倡记忆结构的多元性而可能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也提醒我们应将多元文化记忆的宗教元素一并纳入研究框架。在这一方面,查尔斯·泰勒对“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质疑、德里达的反“单语主义”、乌尔里希·贝克的“宗教间性”方案、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共同体”概念和沃弗(Miroslav Volf)以“正确地记忆”为前提的“拥抱神学”、“和解神学”的启示等公共叙述,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促进我们汉语学界超越西尔弗曼的左翼路径往前走,借鉴并开拓包含宗教研究在内的、更多元的记忆研究路径来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二元对立的障碍,从而深化当代中国文学的记忆研究。

关键词:马克斯·西尔弗曼、羊皮古书的记忆、记忆政治、记忆诗学、同一性与差异性

作者:张蕴艳,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文艺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2013—2014)。研究方向:美学、文学理论、现当代中西文艺思潮等。联系方式:zhangyunyan@sjtu.edu.cn。

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提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世俗时代。其关键变化是一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1]的出现。一方面世俗化意味着宗教命题淡出,但另一方面世俗化又以新的形态即个体信仰经验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而突出了宗教问题的紧迫性。在充满无限分歧的风险社会,如何寻求可靠、信实的正义的根基?依泰勒的意见,必须将世俗的、片段的、现在的瞬间与永恒相连。但一旦把差异性的瞬间与普遍性的永恒相连,就带来如何处理记忆差异性与同一性的问题。而这将牵出一个缠绕了东西方学者多年的传统命题,即有关人道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命题。有无可能、以及如何突破这一困扰?这亟待我们引入新的思想资源,突破原有思考范式的框架来深入探讨。

一、反对“记忆同一性”的提出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问题是与记忆问题相联系的。围绕记忆的理论命题近年不断涌现,无论是从对记忆形式的研究看,还是从对文化记忆的功能的阐释看,当代文化记忆理论家们都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它为巩固群体身份认同、构建统一体、提供公众行动指南乃至实现社会改革或解放等目

[1]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世俗时代》*Shisu Shidai*[A Secular Age],张容南 Zhang Rongnan 等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Shudian[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6),34。

标提供了参照。比如莫里斯·哈布瓦赫关注固定的传承形式与变动的重构形式的关系;扬·阿斯曼认为要通过文化记忆附着在客观外化物上的形式来追寻文化意义。阿莱达·阿斯曼则通过追溯记忆的形式与载体的历史,发现不同时期记忆的形式与载体是不断变化的,从德昆西的“复用羊皮纸”到弗洛伊德的“神奇写字板”再到德里达的“印迹”、“延异”、“文字学”等概念,记忆载体与形式的思考不断更新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记忆的同—性与差异性的包容问题。对文化记忆的功能的思考,如美学家马尔库塞就强调文化记忆反抗现实、实现社会解放的功能的。这对今天全球面临价值共识日趋分崩离析的状况,尤其具有参照意义。

以当代左翼理论家马克斯·西尔弗曼(Max Silverman)的文化记忆研究为例。他的《羊皮古书的记忆——法国与法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大屠杀与殖民主义》(Plimpstestic Memory——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ism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Fiction and Film)一书,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他将记忆研究,特别是灾难记忆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思考。他特别考察了文化记忆当中的灾难记忆的结构,他将之描述为是一种重叠与杂糅结构。所谓“羊皮古书”,即是记忆的重叠与杂糅结构的类似于重写本的隐喻。该书探讨记忆的政治与诗学,大屠杀和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等。其核心命题是反思记忆政治与记忆诗学中总体化的倾向。在该书开始他即借三个法语小说与电影的典型片段说明记忆的重叠与杂糅结构。这一叠合杂糅的记忆结构也是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结构,探讨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政治与诗学,大屠杀、大屠杀的想象与被它所萦绕的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关系,与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差异性与文化记忆、身份认同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他从记忆结构切入这一考察。他看到,后来的记忆时刻,总是会不经意间唤醒前期的某个记忆,比如当人们看到层累的海报的某一时刻,就会重新唤起了在文本中更早的记忆,由此产生一种密集的凝结的意义。一位法国作家迪迪叶·德伦克思的小说《为了记忆的谋杀》^[2]就用这种叠加的广告和标语的意象作为在他书中处于核心的两个事件互相联系的一种隐喻。宗主国对被殖民地,如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暴力造成的灾难,二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二战时期在法国聚集的犹太人被法国警察调遣去死亡集中营;第二个就是我们称作“十月屠杀”的事件,即 1961 年 10 月,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和平示威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被大肆屠杀的事件。作家通过在法国历史上跟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密切关联的人物原型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将之联系起来。他既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又在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任职期间,镇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是“十月屠杀”的重要责任人。在德伦克思小说中类似莫里斯·帕蓬的人物是由一个叫安德烈的负责处理犹太事件的行政长官来演绎的,他在 23 年后,又接受了负责清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前线头领的任命。他既承担连接前后记忆的事件经历者的角色,又是两起暴力事件的见证者,并且因为后一个事件的变型的记忆,前一个事件的初始记忆也被重新挖掘出来。类似这样的一些例子证明了马克斯·西尔弗曼在此书中想揭示的记忆文本的两个方面,首先,现在是在过去的阴影下,过去的阴影可能不是立即可见的,但总是会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变得清晰可见,现在与过去的审美关系形式因此采用的是不同时间轨迹组成繁复结构的叠加和互动,像一个羊皮古书般的新写本,一层轨迹能够通过另一层被转换了形式的轨迹所看见。其次,这种作品中的复合结构不是过去与现在两个时刻的简单组合,而是大量不同的时刻,生产出丰富意义的链条,把全然不相干的时空抽离并杂糅在一起。《为了记忆的谋杀》中,由一起暴力事件的调查引出另一起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暴力事件,因此使人们设想的一种特殊时空会重组生产出另一种不同的时空形式成为可能。重叠的不同文本就是一个时空中多元复合的这一时刻。

[2] Max Silverman, *Plimpstestic Memory——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ism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Fiction and Film*, (New York City: Berghahn Books, 2015), 2.

二、记忆政治的同与异

由上述小说版本的记忆故事可见，记忆与政治不可分割。如何理解记忆政治的概念？有无可能通过一种既不将历史普遍化也不将历史特殊化的方法，在同和异之间的关系中看待记忆？西尔弗曼从记忆政治与记忆诗学两方面作了思考。记忆诗学是对记忆政治的诗学表达，记忆政治是对记忆诗学和艺术实践的提炼。西尔弗曼以多样化的文本展示了两者的互相生发的关系。除上述小说文本之外，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是他倚重的文学文本，而除了研究小说版本的记忆实践之外，西尔弗曼还借助多种艺术形式对记忆的表达来展现记忆的诗学形象。如他指出，电影文本如阿兰·雷奈的《夜与雾》，^{〔3〕}体现了现在被过去萦绕、生命被死亡交织而创造出一种叠加的记忆理念。这个记忆版本，离弃了线性的时间观念，打破战后余波的平静，指向持续的恐怖，转换了种族暴力的不同时刻间的互相联系，其背后的政治内涵包括了戴维·鲁塞、汉娜·阿伦特和其他战后理论家对大屠杀与种族暴力的多维度探讨。又如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4〕}通过演绎在暴力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境遇，尤其是在反犹和反黑色种族主义中，建构了一个互文的和跨文化的诗歌与政治文本；再如戈达尔^{〔5〕}对蒙太奇的运用与本雅明的“星丛”概念和非线性历史方法一致，也是西尔弗曼将记忆政治与记忆诗学融会贯通的一个典型例证。他认为戈达尔创造了图像文献的重写本，不同的图像重叠、互融，以“不可思议的和充满挑衅的方式”把过去与现在在一瞬间集结在一起。这与本雅明论历史观念的形成时对寓言和蒙太奇的运用研究具有可类比性，同样将一种羊皮古书的记忆观念以文化记忆的政治-审美模式呈现了出来，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线性地洞察历史的途径。所以以作为全书核心的羊皮古书概念的发展来看，从弗洛伊德将羊皮古书看作记忆的隐喻，到戴维·鲁塞、汉娜·阿伦特和其他战后理论家对大屠杀与种族暴力的多维度探讨，到本雅明“星丛”概念，再到雅克·德里达的“擦除印迹”，记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辨析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本文试从记忆政治与记忆诗学两方面阐述之。

先从记忆政治的脉络看。二战后，因政治被驱逐出境的戴维·鲁塞，他关于集中营的研究著作《集中营的世界》出版，该书剖析战后的世界，提醒我们注意纳粹极权实验的绝对的新奇性，即他所说的现在“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6〕}鲁塞告诫我们，要把纳粹的统治实验这一知识整合进我们对人类的理解中。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集中营的世界将会重新出现。鲁塞关于集中营世界的思考是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理解极权主义的法则的一个重要的灵感。阿伦特从鲁塞的“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得到启发，认为这固然标志着极权主义法则的绝对新奇性，然而，阿伦特也看到在纳粹集中营独一无二的性质与更多的熟悉的政治景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与张力。她认为，集中营是“普遍的极权统治的社会理念的向导”，^{〔7〕}集中营世界与集中营之外的世界有深刻的联系。她更注重其间的独一性和联系性，相同与差异等关系。但西尔弗曼认为鲁塞和阿伦特著作有一点相似，就是他们都试图将日常生活的平庸性陌生化，来表明战争的恐惧的持续性，并对人类在战后生活的观念重新进行激进的塑造，来呼求我们已然麻木的平庸的意识。^{〔8〕}西尔弗曼既肯定他们的敏锐思考，肯定鲁塞和阿伦特在集中营、帝国主义和现代种族科学之间交叉部分的洞察，认为他们打开了在“规范”的世界之上的极权统治的研究空间，但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在理解暴力的记忆的不同模式方面，还有可探讨的空间，总体而言他认为对集中营世界（和它代表的极权统治的系统）与战后大屠杀的特性

〔3〕 *Ibid.*, 41.

〔4〕 *Ibid.*, 72.

〔5〕 *Ibid.*, 124.

〔6〕 *Ibid.*, 12.

〔7〕 *Ibid.*, 12.

〔8〕 *Ibid.*, 13.

之间的差异性,需要基于一种更广泛的时空连接的事件记忆的分析。

基于对记忆作时空连接的分析诉求,西尔弗曼延续鲁塞和阿伦特的探讨,进一步把记忆政治的问题聚焦于纳粹主义、反犹主义和种族大屠杀、殖民主义之间的类比关系。他认为法农反对黑人殖民种族主义的著作《黑皮肤,白面具》很大程度上是以萨特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9]的反犹主义的模式为基础的,法农把纳粹主义当作欧洲中心论的殖民心态,这一类比与鲁塞将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集中营进行类比,有一致性,而西蒙·波伏娃的《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10]也以同样的类比法讨论了战后法国不同的集中营之间的联系。类比的记忆可谓比比皆是,类比法记忆是有问题的,但类比记忆中联系的法则西尔弗曼还是部分认同的。他认为,记忆多样性的表现,不宜仅在纳粹主义或反犹主义单方面进行考察,而应联系考察记忆的另一面相,如记忆纳粹主义之外的殖民主义的暴力。比如前述清理二战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关系,就应在记忆的时空连接的立体维度来进行。这就需要追溯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

由此,弗洛伊德的屏障记忆理论(screen memory),^[11]首先被提出来了。西尔弗曼之所以选择弗洛伊德,与他接着弗洛伊德探讨并倚重的德里达的理论密不可分。德里达提出的关于延异(différance)、文字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等诸多理论命题的一个基础,就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解构。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等书中详细解构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脉络与诸多面相。“解构”于德里达而言并非是一种普遍性的“否定”,而是“一种肯定的‘是’”。^[12]他认为只存在特定的而非一般普遍意义的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解构,^[13]那些使社会、技术转型了的事件就可谓是解构性的事件。因为由于这些解构性事件带来的转型,新的形式开始发生作用。所以解构问题包含着记忆元素,因为首先是回顾,即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德里达说“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14]解构意味着首先是尽可能地重建文化霸权的谱系,分析它过去从哪里来?为什么现在获得霸权地位?其次,解构的责任是转变场域,转移、叛逆、质疑霸权。由此,德里达指出解构那些浓缩并沉淀在弗洛伊德话语中的形而上学概念和语句具有必要性,因为心理分析与形而上学具有霸权的共谋性。这样,德里达追溯了弗洛伊德从 1895 年《科学心理学草案》到 1900 年《梦的解析》再到 1925 年《神奇写字板笔记》的记忆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弗洛伊德的阐释越来越符合他的书写印迹的隐喻。认为“神奇写字板”的发现,让弗洛伊德认为心灵装置的全部内容都会投射到这个具有神妙复杂性的书写工具上,认为可以帮助他解释记忆。^[15]这一点下面谈到记忆诗学时还会进一步涉及。总之,经由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解构跳板,西尔弗曼首先质疑了弗洛伊德的屏障记忆理论。屏障记忆理论说的是一种记忆被另一种记忆所代替的记忆机制。一种记忆成为另一种更麻烦的经历的代替,并且只有通过复杂的连接着最初的创伤记忆的替代程序才能实现。替代虽然也许凑效,但不是简单地忘却和抹去,因为它反而变相地创造了双倍的程序,通过它被替代物继续以一种可见的形式存在。并且,不同事件之间的类比有不同的功能,殖民压迫的牺牲品运用它和殖民者运用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西尔弗曼提出,殖民记忆和法西斯记忆是重叠的、互相生发的一对孪生子。由此西尔弗曼还追溯了战后的其他理论家的探讨,指出 1980 年代大屠杀与殖民研究的学科壁垒也反向促成了德伦克思、塞巴等人的艺术实践在大屠杀和殖民想象之

[9] *Ibid.*, 14.

[10] *Ibid.*, 14.

[11] *Ibid.*, 16.

[12]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书写与差异》Shuxie Yu Chayi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16.

[13] *Ibid.*, 14.

[14] *Ibid.*, 15.

[15] *Ibid.*, 360.

间建立起了互文性的联系。而近些年兴起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则既不是回到旧的普遍主义,也不支持种族特殊主义,而是梳理出差异与同一,寻找相互重叠交叉的部分。韦伯、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齐格蒙特·鲍曼)的观念中,大屠杀必须在更广阔的合理化的现代性的结构中来衡量。西尔弗曼引用一位理论家的话认为,“否定奥斯维辛的独特性并非都是修正主义者,而只为奥斯维辛的独特性争辩就有可能也会无视其他场所的暴力。保持种族屠杀的记忆最好的方式既不是否定其他的种族屠杀,也不是树立宗教崇拜。”^[16]他警惕一种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话语,认为在这种普遍主义话语中不同时刻的灾难是被混淆进单一的叙述中的,因此他坚持每一特殊时刻的灾难与普遍的灾难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性。这就是他从记忆政治的角度质疑弗洛伊德对屏障记忆的替代功能的分析的理由。

由对弗洛伊德的屏障记忆理论难以摆脱单一性的评价,西尔弗曼继续探讨了由雅克·德里达重塑的弗洛伊德的记忆痕迹观念,也一并讨论了在埃伦娜·西苏(Helene Cixous)、德里达、帕特里克·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和鲁道夫·哈马迪(Rodolphe Hammadi)等著作中发掘的有关历史与记忆交汇之处的思考。以西苏和德里达的文本比较为例,西尔弗曼由他们作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犹太人同样经历过的童年创伤经验谈起,触及了大屠杀与殖民主义等多元化的问题。埃莱娜·西苏1937年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犹太裔父亲和德奥血统的母亲复杂家庭身份使她在犹太人与殖民者的两重困境中产生认同危机。相似的境遇使德里达对埃莱娜·西苏有深刻的同情的理解和评价。德里达自己也在《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割礼忏悔录》(Circonfession)等书中反思并发展出独特的记忆差异性理论。德里达反对一种简单的强调语言、文化与身份的一致性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把单语主义看作是多语主义的反面,把单边文化主义看作是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样性的反面,而德里达认定的则是一种既不是单语,也不是双语,也不是多语的经验,不是1,2,或 n 的数字叠加,而是存在着一种即使单语也仍然是数不尽的语言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可以在同时既是单数也是多数。^[17]也就是说,这种强调既非此又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间性的观点,对在记忆研究领域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是极具启发性的。也即,在某一单个的时间节点上,凝聚着多个差异性的经验与记忆,这一差异在时间轴上体现为“延异”,在时间的空间化中,表现为“痕迹”。德里达对特殊与普遍的张力的把握,也体现在他对割礼的反思中。一方面他看到割礼的独特性,他自己遭受的无法压抑的伤痛的割礼,组成了他自身的绝对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无法被他人取代的创伤记忆;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犹太人的割礼与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每一种伤痛之间存在互文性的类比关系。也即,在任何有关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或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都存在着一种类似割礼的东西,身体上的某个不可磨灭的标志和伤痛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也应弱化个人的与普遍的、历史特殊性与普世适用性的边界。西尔弗曼认为德里达这种拒绝按照“同一基因的霸权”来定义犹太身份的姿态,他是认同的。但西尔弗曼同时又对德里达有所反思,他认为德里达与西苏通过展示在特殊性中的不可避免的他者痕迹,在他们的著作中取笑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这种态度基本没有突显他们提出的进行双重思考(纳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哲学姿态。他认为他们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揭示了在不同历史之间的“十字结点”。通过关注“十字结点”,把文化记忆与后殖民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将德里达质疑的单语主义、本质主义的差异视角落到实处。

三、记忆诗学的异与同

西尔弗曼的记忆诗学主要是指对记忆政治的艺术机制和形式的探索。包含隐喻、转喻、蒙太奇、

[16] Max Silverman, *Plimpstestic Memory-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ism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Fiction and Film*, 19.

[17] *Ibid.*, 152-155.

寓言、类比等形式。西尔弗曼首先截取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开启此一话题。^[18] 故事中的人物马塞尔, 在一个大花园绊倒后, 发现自己踉踉跄跄站在两块凹凸不平的铺路石上, 那一时刻他突然思如泉涌, 埋葬的记忆洪水般涌现回来了。巴黎与威尼斯, 来自过去的不同的时空的记忆在现在这一刻因同样的经验触发了。这个时刻对普鲁斯特而言, 标志着重新发现失去的时间的可能性。这一景象对西尔弗曼的记忆诗学的启示是, 首先, 现在包含着过去的踪迹, 这些踪迹可能到处都在; 第二, 与第一点相关, 通过记忆的激活, 转换了日常生活中平庸无奇的感觉, 从而赋予现在以变革的行动, 所以在这意义上是过去塑造了现在, 记忆是当下的现象, 即当关注过去时, 有些事在现在发生了。第三, 他关注影响这种感觉转换的艺术机制或艺术象征。比如隐喻和转喻就是一种转换机制。隐喻通过对不同事物相似性的观察而把两个分离的要素提取在一起。隐喻的真正力量不是简单的像弗洛伊德的屏障记忆一样在于用一物替代一物, 而是像波德莱尔所说的, 在它们之间创造“客观对应物”,^[19] 并且在此过程中, 双方都得到重新的改造。西尔弗曼对隐喻的创造功能赋予极大的期望, 他认为隐喻是创造性的和转换性的程序, 它将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意义链打破并作了陌生化处理, 把最不可能相容的元素连接在一起, 重塑了我们的想象, 创造了过去与现在的新关系, 并因此迫使我们在这互相连接的两个元素都重新进行反思。隐喻不是简单地把一种元素折叠进另一种以便让它们统一, 也不是保持它们各自的完整差异互不干扰。它的美在于它通过同一与差异创造了不具稳定性关系的客观对应物的事实。

隐喻的作用还不局限于艺术领域, 它也是记忆诗学的重要形式。它既是穿越时空旅行的完美工具, 也是现代主义语境下探索身份认同的完美工具。在此意义上, 西尔弗曼认为隐喻与转喻并无大的区别。转喻在普鲁斯特笔下引发的对于相同时空的瞬间的震惊体验, 意味着转喻是隐喻作用的一个紧密的重叠部分, 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理论家的分类那样, 把它当作是一种僵硬的结构分析。^[20] 西尔弗曼认为弗洛伊德是精确地抓住了隐喻与转喻的紧密重叠的特征的。他看重的也是德里达同样看重的弗洛伊德发表于 1925 年的《‘神奇写字板’笔记》, 认为他发展了作为羊皮古书的记忆的理念。^[21] 弗洛伊德描述了孩子如何用书写玩具抓住双重记忆机制——无限的接收信息和持久地保留信息的机制, 即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所说的印迹的永久性与接收体的“童贞性”,^[22] 在纸上或写字板上写字有一个缺点, 或者接收信息是有限的(纸上的笔记), 或者没有能力恒久保持(写字板必须擦干净为新信息留路)。因此弗洛伊德观察到, 无限的接收信息的能力和持久地保留信息的痕迹看似是互相排斥的性能, 近似于我们用替代物来记忆: 更新接收表面, 或者破坏笔记。然而, 神奇写字板(类似于复写纸)演示了同时进行这两个功能的可能性: 铭文写在赛璐珞薄纸上覆盖画板上层部分, 能通过揭起纸张被擦除, 这样可以腾出余地继续在上面写字。写字板的隐喻给弗洛伊德提供了简单的形式来确认他的记忆思想。他看到, 虽然表面上看接收自在在世界的感受在心理上不能保持持久, 因此带来一种无限的接收新印象的能力, 但在深层水平上, 这些感受印象还是作为无意识的记忆留下了痕迹。

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将梦处理为某种秘密书写文字(Geheimschrift),^[23] 以一个固定的“钥匙”, 将每一个符号都转译成另一种符号, 到二十多年后《神奇写字板笔记》对《梦的解析》关于心理书写(psychographique)的隐喻理论进行反思, 德里达认为将梦与某种文字系统相比较比与某种语言相比更准确。他认为梦的解析类似于某种古代象形文字的辨识。梦的多义性与古代文字系统存在着对

[18] *Ibid.*, 22.

[19] *Ibid.*, 23.

[20] *Ibid.*, 24.

[21] *Ibid.*

[22]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书写与差异》Shuxie Yu Chayi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363.

[23] *Ibid.*, 375.

称性。这样才可确保一种可理解性。^[24] 所以德里达就这样从对弗洛伊德关于心灵机制的分层重叠过程的研究,即研究记忆印迹(Erinnerungsspuren)的调整、转录、重复性呈现,或记录不同种类的符号等心灵书写,转变为文字学的阐释路径。他认为弗洛伊德早期记忆理论的“裂口”即在于像“梦的解析”这样的“心灵书写”的“非转译性”理论,在生产差异的同时抹掉了它。所以他更看重后期的《神奇写字板笔记》,并批判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神奇写字板记忆理论,认为需要转换弗洛伊德提出的这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记忆模式。但他承认记忆叠加原则仍然不失为是记忆机制的有力方式。因为它暗示着一种时空的心理重整,这颠覆了现代性合理化分类的权威性。西尔弗曼认为这一点同样也为超现实主义所运用,超现实主义同样发掘出弗洛伊德派的记忆原则,而超现实主义也影响了鲁塞和阿伦特,促进他们寻找新的语言进行日常生活的陌生化。

除了隐喻和转喻,蒙太奇也是记忆诗学的一种重要艺术机制和艺术形式。蒙太奇是另一种在同一空间把不同元素编织在一起的象征性形式。以本雅明为例。西尔弗曼认为本雅明综合了普鲁斯特、波德莱尔、超现实主义以及弗洛伊德无意识记忆痕迹等理论,将个人心理记忆与社会历史记忆进行了理论化的整合。如他的《拱廊街计划》、《漫游者》、《历史哲学论纲》等书。如果说《漫游者》中的漫游者是未经理论化的个人,一个处于无意识与意识的层累叠加的个人,那么在《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提炼了这样一种层累叠加的状况,他把这种时刻称作一种“形象”(“image”),一个“星丛”(“constellation”)或一个“关键时刻”(“critical point”):

“不是过去把光投到现在,也不是现在把光投到过去;而是,形象是一个星丛,在其中过去与现在一起闪现,换句话说,形象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过去和现在的辩证法。因为当现在对过去的联系是纯粹时间性的时候,已经经过的关系对现在来说是辩证的:不是在时间的本质的意义上说,而是在象征性的比喻上来说。只有辩证性的形象是真正富有历史性的——即,不是过时的——形象……”^[25]

西尔弗曼认为本雅明正是借助蒙太奇的形式,让时间空间化以便让历史的辩证运动变得可见。他不同意阿伦特为本雅明的《启迪》(Illuminations)写的导言中引用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说法,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是“非辩证的”,静止的。阿伦特参照《漫游者》的形象与《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对保罗·克利斯的画《新天使》的历史角度的讨论,赞成阿多诺的看法。而阿多诺认为与其说本雅明思想是辩证的,不如说他充满的是隐喻性的想象。但西尔弗曼认为,本雅明思想中隐喻性想象是与辩证思考共融的,他只是转变了直线性、横组合的思考方式,变成纵聚合的方式将各种历史事件叠合在一起。他也反驳阿伦特对本雅明著作中关于隐喻与寓言的区分,认为这是很奇怪的读法,因为本雅明的寓言体很大程度上是以波德莱尔对寓言模式的探索为前提的。隐喻与寓言在本雅明这里不是对立的,而是两者都对他纵聚合的新思考范式起作用。

西尔弗曼在跨民族、跨文化和信息时代对文化记忆的政治和诗学的追溯,提醒我们在身份政治的记忆博弈中保持历史的视角,抵抗健忘症,也提醒我们警惕由于全球化时代新媒体的快速增长对记忆的柔性塑造,以及反过来,同时警惕由于信息超载导致我们的记忆容量减少、直至面临记忆僵尸化的危险的状态。羊皮古书的记忆提供了一种在杂糅的而非纯粹单一的分类意义上来塑造记忆的景象。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批判的空间,打通了从现在的平淡的表面到历史的“十字结点”的通道。在此,他认为德里达提出的一种后启蒙的“世界主义”来代替康德的启蒙的世界主义,是极富价值的,因为德里达挑战了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区分。他认为他提出的羊皮古书的记忆为人类保持德里达所说的“将临的民主”的“世界主义”愿景提供了方法。所谓“将临的民主”,德里达在《无赖》(Voyous)一书中,对此多有描述,这种“将临的民主”,德里达更多地是使用悖论进行表达的,比如称为“绝望或令人绝望

[24] *Ibid.*, 396.

[25] Max Silverman, *Plimpstestic Memory-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ism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Fiction and Film*, 26.

的弥赛亚性”。“将临的民主”不是“未来的民主”，而是“具有允诺结构的民主——因此是对此时此地包孕未来的东西的记忆”。“将临”不仅表示允诺，而且表示“民主从未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上存在过”。^[26] 德里达也赋予“将临的民主”某种宗教意味：“对于民主来说，时间永远不够”；“对于将临的民主，它需要提供尚不存在的时间”。德里达疑惑将“将临的民主”与“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的回归相联系，能否归结为“某种未明言的神学要素”。因“将临的民主”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循环：既需要时间又取消了时间。^[27] 西尔弗曼非常看好德里达的这一主张，认为基于这样的主张重塑的记忆空间将是个动态的开放空间，它由不同的声音、立场和时代的相互连接的痕迹组成，塑造了跨越种族与民族界限的团结的前景。

四、记忆同一性的人道主义维度、认同难题及超越的可能性

西尔弗曼借助于德里达的研究将记忆命题放在多元时空中进行考察，其对记忆结构的“连接”、“杂糅”、“重叠”等多元化特征的强调，以及将有关纳粹主义的记忆事件与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问题相连接的倾向，可以让我们看到其思想中鲜明的左翼色彩。也由于他的记忆研究是与后殖民主义等研究结合在一起，所以探讨其记忆理论还应放在全球化格局下并进入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中来观照。德里达成为承载他的多元交叉研究的一个典型的个案。从德里达的困惑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折射西尔弗曼的理论的某种局限。邓晓芒曾质疑德里达从语言学到文字学的转向，认为德里达以汉语为参照系的解构理论并不能真正摆脱语言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汉语的特性导致不能将之引向文字的创造，而是“引向（一切言语和文字的）沉默、无言和失语”。这与德里达提出“文字学”不是抛弃而是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初衷相悖，所以邓晓芒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28] 事实上如上所述德里达自己也承认解构不具宽泛的指向而是针对具体语境的解构，并且解构包含着建构。或许这也是德里达对自己的解构理论的悖论的一种辩解。但无可否认，对解构和后现代理论质疑的声音中，普遍会谈到一个可能会存在的悖论：即包括德里达在内的这种强调差异性质疑同一性的西方左翼理论或后现代主义，他们既要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又以自己的理论言说亲身加入了逻各斯中心的行列。是否存在这一悖论，如何摆脱这一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困境，西方当代理论家们作了大量的探讨。以人道主义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典型话语表征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大量理论争论中隐含着对无力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焦虑感。在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关于记忆差异性与同一性的探讨，同样离不开这一背景。

后殖民主义是不是一种人道主义？以往有多种争论，肯定的意见比如法农，就是把后殖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考虑的。比如 1961 年他在《天下可怜人》中就写下未来非洲的独立宣言，带着走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愿景。在为阿尔及利亚独立于法国而作斗争的时候，法农没有简单的忽略欧洲人道主义的传统，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批判的运用和超越那些早期的欧洲人道主义形式限制的一种人道主义。后来当代的一位美国的后殖民主义左翼理论家凯文·B·安德森，他指出法农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但也不是东方共产主义的一

[26]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无赖》Wu Lai[Voyous],汪堂家 Wang Tangjia,李之喆 Li Zhizhe,译.上海 Shanghai: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1:114-115.

[27] *Ibid.*,143-153

[28] 邓晓芒 Deng Xiaomang,《德里达: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的转向》,Derrida: Cong Yuyanxue Zhuanxiang Dao Wenzixue De Zhuanxiang[“Derrida: The Turn From Linguistics to Grammatologie”]中国现象学网 <http://philosophy.sysu.edu.cn/phaenomenologie/xzzl/xzdxm/3258.htm>

种方式。笔者翻译过一篇凯文·B·安德森的文章，^[29]他回顾了西方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包括萨特、弗洛姆、福柯、布迪厄及法农等人的人道主义观点，重点探讨了一些东欧的人道主义的观点，比如科西克的具体的人道主义，以及他最看重的杜那耶夫斯卡娅的人道主义，提出以具体的人道主义来对抗所谓的普遍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具体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延续了福柯“具体的普遍性”的说法，对差异性与同一性、普遍性的关系思考是颇具启发性的。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完全地解释人道主义话语面临的理论和现实的某种难题。理论难题比如，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资源，到底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负面的资产和障碍？帮助在于，在理论上殖民主义的理念是有意地对人的地位身份进行了一种剥夺，取消了主体自由。人道主义理论因此仍然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源来抵抗殖民策略，或为批判某种社会制度（比如帝国主义制度）缺陷提供动机和指导。但另一方面，作为障碍，关于人性和权利的普遍性观念在历史上又曾被利用来作为一种正义的修辞，为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与控制张目，这就不是不值得质疑的。但显然这一问题还不应止步于思想上逻辑上的探讨。从现实看，比如利比亚难民危机就是凸显其现实难题的一个例子，在此问题上左派和右派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仅仅在后殖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框架之内是不足以来讨论这种差异与同一的两难问题的。即一方面是人道主义内含的文化多元主义可能带来的那种包容性，但另一方面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又内含了某种文化相对主义，它导致一些少数民族更加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封闭状态是极易于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土壤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历史记忆的立体的维度来作探讨就显得必要。通过对不同时刻暴力的洞察分析，归纳总结种族暴力和恐怖的特征及实质，重新评估人类面对极端恐怖主义的警醒能力，马克斯·西尔弗曼的多元记忆结构研究因此就显示出他独特的价值。他认为特别是在这更近的几十年里，极端暴力的历史已经趋向于划分出记忆的人种-文化界限，因此看清多维多向的文化记忆与政治记忆的联系，才能在面临有关极端暴力和恐怖的现象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诗学与艺术文本时更具洞察力。西尔弗曼挑选的许多文本，正是这种坚持记忆的杂糅性、层累性和动力性的宝贵见证。为了介入文化记忆在跨民族年代的争论，提出一种不同的看待过去的暴力以及它与现在和未来关系的方法，采用“羊皮古书的记忆”这一术语，正是因为它暗含着所有这些通过类比、隐喻、转喻、分类、蒙太奇、寓言等手法将分立的记忆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特点，从而达到他所希望强调的以时间的空间化作为记忆作品中心的目的。

但把人道主义的实践的因素纳入记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理论探讨，并不意味着关于人道主义命题的理论困境就此解决了。如何突破人道主义普世性的特点与多元个体记忆特殊性的某种矛盾？西尔弗曼的“羊皮古书的记忆”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命题，不过他对多元结构的记忆思考提醒我们亟待将多元宗教文化记忆纳入研究框架当也是事实。从特殊的多元个体记忆如何达到个人身份、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查尔斯·泰勒揭示了“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局限性，这种人文主义由于切割了宗教维度，其世俗化取向是难以充分回应这一认同难题的。泰勒在此书中区分了三种世俗性模式及指涉的宗教形态，1)世俗化的公共空间，宗教退出公共空间；2)信仰及其实践的衰落，宗教不论退化与否，都仅作为信仰与实践的一种类型；3)由信仰的几个新的境况组成，新形态赋予信仰以经验，此经验提示信仰，又被信仰所界定。它结束了前现代“天真承认”的信仰状态，其关键变化是这种世俗化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出现。泰勒更关注第三个维度的境况。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公共领域人与超越人间福祉的善比如圣爱的关系。依泰勒的意见，必须将世俗的、片段的、现在的瞬间与永恒相连。当代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充分认同泰勒的这一思考，他认为泰勒在《认知的政治》(The

[29] 凯文·B·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Jiegou Zhuyi He Hou Jiegou Zhuyi Zhihou De Rendao Zhuyi[“Socialist Humanism After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探索与争鸣》Tansuo Yu Zhengming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3(8):75-79.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中区分的“平等尊严政治”与“差异政治”非常重要, 对思考同一与差异问题尤其富有启发。“平等尊严政治”寻求普世一致, “差异政治”基于对个人独特性的尊重, 在此基础上寻求身份认同。^[30] 沃弗与泰勒从宗教问题切入同一与差异的思考进路, 颇多类似之处, 但泰勒天主教的立场与沃弗基督教的立场终又有相当的区别; 另一从宗教进路思考此一问题的思想家如乌尔里希·贝克, 他提出“宗教间性”(Inter-religiosity) 理论, 探讨在 21 世纪“世界诸宗教的相互接触与彼此渗透”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这意味着各种普遍主义理论之间的“绝非转瞬即逝的碰撞”; “宗教间性”的对立面是“把其他信仰的追随者贬低为无信仰者或异端, 并质疑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充满了密集交流的世界里, 所有的信仰者或无信仰者, 不论其信或不信什么, 都发现自己在信仰者(或无神论者)的家园与(宗教他者眼中的)无信仰者的流放地之间变换位置”, 贝克认为这种粗略分类引起了“四处弥漫的焦虑, 在宗教的激发下这种焦虑还有可能以暴力而告终。”^[31] 针对宗教激进主义引发的风险危机, 贝克结合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进一步提出对此问题的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解方式和应对方案, 即消解现代社会“简单现代化”的“非模糊性逻辑”, 而运用“模糊性逻辑”, ^[32] 模糊各种宗教的文化边界。贝克这一对宗教与文化关系的具实用色彩的处理, 由于站在过于相对主义的立场, 在“真理与和平”的关系上过于倾向于“和平”与同一一端, 过于模糊了宗教之间的边界, 而削弱了真理性与差异性的维度。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直面而是回避了文化多样性的命题, 也淡化了伴随文化多样性而来的日渐紧迫的宗教冲突命题。这样看来, 我们需要一种类似查尔斯·泰勒等人的宗教方案, 来应对“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设置的宗教壁垒, 以更开放的态度, 把宗教的文化记忆也纳入到“公共叙述”(public discourse) 中来。这方面当代许多记忆研究学家也都已开始探讨。比如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记忆的共享和记忆共同体问题。这一问题同样与对记忆的差异与同一关系的认识有关, 她提出“记忆共同体”^[33] 和“普遍的伦理共同体”的概念。^[34] 认为关爱的伦理共同体是积极的记忆, 包含创造和十字架上的牺牲等。玛格利特虽借助了基督教的思想资源, 也保留着对这种理念的期待, 但他还是认为这种理念逻辑上可行而现实中不易转化, 所以他表示宁愿“退而求其次”, ^[35] 还是回到人本主义的立场, 认为要把伦理和道德的正当性系于人, 而非立基于“更高性”的存在。他的这一认识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看有些问题, 但这一路径的选择具有代表性, 有待深入探讨。而与玛格利特的人本主义立场不同, 当代公共神学神学家沃弗等人则以上帝为中心对记忆同一性与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神学阐释。沃弗延续并发展基督教神学家莫尔特曼盼望神学的思想, 与左翼路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以及道德哲学等路径构成了有意义的潜对话, 也亟需作进一步的甄别和考察。如沃弗的近作《记忆的力量——在错误的世界, 迈向盼望》中, 他提出“承认”的途径来将记忆想成是获得拯救的方法。^[36] 倾听受害者的声音是第一要务。但前提是记忆

[30] 沃弗 Miroslav Volf, 《拥抱神学》Yongbao Shenxue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王湘琪 Wang Xiangqi 译, 台北 Taipei: 校园书房出版社 Xiaoyuan Shufang Chubanshe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民国 96), 19.

[31]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自己的上帝: 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Ziji De Shangdi: Zongjiao De Heping Nengli Yu Qianzai Baoli [Der Eigene Gott], 李荣荣 Li Rongro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5), 148.

[32] Ibid., 61.

[33]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记忆的伦理》Jiyi De Lunli [The Ethics of Memory], (北京 Beijing: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5), 64.

[34] Ibid., 67.

[35] Ibid., 69.

[36] 沃弗 Miroslav Volf, 《记忆的力量——在错误的世界, 迈向盼望》Jiyi De Liliang——Zai Cuowu De Shijie, Maixiang Panwang [The End of Memory: 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 台北 Taipei: 校园书房出版社 Xiaoyuan Shufang Chubanshe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2012: 58.

必须真实,是在记忆基督十字架上受难的前提下去正确地记忆。这种记忆的“合一”,是以基督教的上帝为中心同时结合了人文主义思考的一种神学理论。这种思考对二战、种族大屠杀、殖民主义都是极富启示的资源。对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同样也有深刻的启迪。比如,众多关于“文革”的伤痕文学仅在受害者层面倾诉了富有个体差异性的创伤记忆,这对突破记忆政治的总体性是极为必要的。但获得了差异的真实性之后,有无可能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和解与认同?而缺乏神性维度的“记忆同一性”是有真实性的硬伤的(张志扬《创伤记忆》一书对无神的“记忆同一性”亦有许多批判和分析,它是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告别无神的“记忆同一性”,建立神学观照下的“记忆同一性”,或许才是处理文化记忆的差异与同一关系的一条可能的合理性路径。这是将沃弗的以“正确地记忆”^[37]为前提的“拥抱神学”、^[38]“和解神学”^[39]的启示引入有关记忆差异性与同一性关系的公共叙述的理由。总而言之,这些关于记忆的思考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促进我们汉语学界超越西尔弗曼的左翼路径往前走,借鉴并开拓更多元的记忆研究路径来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的障碍,从而深化当代中国文学的记忆研究。

[37] *Ibid.*, 37.

[38] 沃弗 Miroslav Volf,《拥抱神学》Yongbao Shenxue[*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23-24 等页.

[39] Miroslav Volf, “Difference, Violence, and Memory”,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2009(74): 3-12.

English Title:

The left-wing Route of “Memory Identity” and Its Identification Dilemma—Focusing on Max Silverman’s Plimpsestic Memory——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ism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Fiction and Film

ZHANG Yunyan, Ph. D.

Normal University of East China,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in Manchester University (2013 – 2014). Major in Aesthetics, Theory of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s of Arts. Address: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Shanghai, P. R. China. Email: zhangyunyan@sjtu.edu.c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Max Silverman’s book *Plimpsestic Memory——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ism in French and Francophone Fiction and Film*, a study on tran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dynamics of memory.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of memory and poetics of memory, the author has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of “Plimpsestic Memory” put forward by Silverman, that is, Silverman advocates a multiple and interconnected memory structure of layer and hybri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rather than single or Binary. His memory theory is a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the binary oppositional proposi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at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field of humanitarian discussion. The method has dynamic and open features. However,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that may be caused by the advocacy of the diversity of memory structures also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incorporate memories of multi-religious cultural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n this respect, Charles Taylor’s questioning of “exclusive humanism”, Jacques Derrida’s anti-“monolingualism”, Ulrich Beck’s “inter-religiosity” theory, Avishai Margalit’s concept of “Memory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narratives such as the revelation of “Embrace Theology” and “Reconciliation Theology” predicated on “Remembering Rightly” by Miroslav Volf, which helps us to promot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surpassing Silverman’s left-wing route, borrowing more research resources and exploring more routes to transcend barriers of binary opposi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us deepening the memory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Max Silverman; Plimpsestic Memory;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Poetics of Memor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